



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 實地考察論文集

張德芳 孫家洲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 實地考察論文集

張德芳 孫家洲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地考察論文集 / 張德芳，
孫家洲主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5325-6545-0

I. ①居… II. ①張… ②孫… III. ①居延漢
簡—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56175號

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地考察論文集

張德芳 孫家洲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顯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8.25 插頁24 字數 336,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

ISBN 978-7-5325-6545-0

K·1610 定價：9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說 明

這本論文集分別是作者們赴居延和敦煌兩地漢塞烽隧漢簡出土地考察的成果。赴居延考察的時間是2006年7月27日至8月3日，赴敦煌考察的時間是在兩年後的2008年8月21日至8月27日。

赴居延考察的活動是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德芳和中國人民大學孫家洲發起組織的，並得到了雙方單位領導的大力支持。考察人員和考察路線書後郝樹聲《居延考察日記》有詳細記載，此不贅述。

赴敦煌考察時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業已成立，故由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起組織。敦煌考察因未留下詳細日記，在此略作交待。

參加人員：

- 邢義田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廖伯源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陳文豪 臺灣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教授
- 黎明釗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 宋 超 《歷史研究》雜誌社編審
- 劉華祝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孫家洲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 楊振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 馬 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 劉樂賢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侯旭東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春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忠燁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
岳小東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
肖從禮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館員
韓 華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館員
杜慶軍 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碩士
史爾青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辦公室主任
張德芳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兼考古所副所長、研究員
此外還有甘肅電視臺記者陳璇等三人和司機多人。

考察日程：

2008年8月21日星期四，報到、集中，住蘭州金輪賓館。下午參觀漢簡，晚上招待晚宴，領導致詞。

8月22日星期五，從蘭州出發。中午在武威參觀武威博物館。路過張掖參觀張掖大佛寺。晚上住酒泉。

8月23日星期六，從酒泉出發，路過參觀嘉峪關城樓和長城博物館，中午到瓜州參觀瓜州博物館，下午到敦煌參觀莫高窟。

8月24日星期日，凌晨5點出發，先後到馬迷兔、凌胡隧、廣武隧、大煎都侯官、田遺址、清水溝、馬圈灣、當谷隧、漢長城、玉門關、河倉城等漢代遺址實地踏查。

8月25日星期一，參觀西千佛洞、陽關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晚上到月牙泉。

8月26日星期二，赴安西榆林窟、鎖陽城考察。

8月27日星期三，部分專家從敦煌直接返回。部分專家考察懸泉置遺址。

8月28日星期四，考察結束，返回。

書後選登兩次考察的部分照片，以資存史和流佈。

論文集的編輯工作由楊眉完成。

論文集的編輯拖了很長時間，對作者和讀者來說都是一份遲到的晚餐。但也許唯其遲到，才讓人更期待。

上海古籍出版社六編室主任童力軍和相關編輯在論文集編輯過程中辛勤勞動，高效率工作，在此謹致謝忱。

張德芳

2012年11月20日識於蘭州

目 錄

居延漢簡及其相關的人和事	張德芳	(1)
漢代郡縣鄉亭之等級	廖伯源	(9)
全球定位系統(GPS)、3D 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 ——以額濟納河烽隧及古城遺址為例(增補稿)	邢義田	(21)
《津關令》所見五關與漢初諸侯王之關係	黎明釗	(49)
“匈奴人”與“胡虜”：兩漢時期匈奴稱謂變化考察 ——以居延漢簡為中心的討論	宋 超	(69)
“虎落”遺物考釋	孫家洲	(85)
武威漢墓幡物釋考	馬 怡	(91)
“帛”在漢代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	楊振紅	(99)
漢代敦煌郡轄境郵、亭與置驛的設置	李岩雲	(111)
漢代玉門關百年考古調查綜述	傅立誠 石明秀	(125)
額濟納居延漢長城保護現狀及利用前景	那仁巴圖	(133)
居延遺址與世界文化遺產	那仁巴圖	(137)
敦煌漢塞烽隧考察	岳曉東	(141)
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吏員的用餐記錄	張春龍	(145)
《額濟納漢簡》中的兵器買賣契約	劉華祝	(153)
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	胡平生	(159)
讀水泉子漢簡《日書》	劉樂賢	(171)
居延漢簡“寒吏”稱謂解讀	王子今	(179)

居延漢簡所見“助吏”	趙寵亮	(185)
《居延新簡》所見“購償科別”冊書復原及相關問題之研究		
——以《額濟納漢簡》“購賞科條”為切入點(增訂稿)	張忠煒	(191)
懸泉置出土簡牘文書所見的馬	張俊民	(215)
懸泉漢簡中的“赤兔馬”探微	韓 華	(247)
敦煌漢簡《風雨詩》考	肖從禮	(251)
讀《敦煌漢簡》劄記三則	杜慶軍	(261)
居延考察日記	郝樹聲	(269)

居延漢簡及其相關的人和事

張德芳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

居延漢簡的發現，由來久矣。據唐人牛僧儒《玄怪錄·周靜帝居延部落主》記載：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曾令人掘得一古宅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千。檻旁有穀麥，觸即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文中所謂“竹簡書”，當是漢代邊塞的遺物，應是居延漢簡的最早記載。周靜帝是北周最後一位皇帝，公元 579—580 年在位。其時距今已 1 400 多年。因年代久遠，當時情況只有隻言片語的記載。

真正居延漢簡的大量發現，是近幾十年的事。第一批在 1930 年代，第二批在 1970 年代。還有 1990 年代的《額濟納漢簡》。本文主要談第一批居延漢簡的發現、整理及其影響。

第一批居延漢簡的發現，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①取得的標誌性成就，而該團的組成以及那一幕幕感天動地的考察活動，爲中國近代學術史增加了激動人心的篇章。考察的時間，從 1927 年至 1935 年，歷時八年之久；參加的中外科學家，先後有 44 名之多；考察的西北 4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幾乎是中國國土面積的一半；涉及的學科，有地質、地磁、天文、氣象、人類、考古、民俗等諸多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仍是相關學科的開山奠基之作；考查團的成員，大都站在了後來他們所從事學科的巔峰之上，成了蜚聲中外的著名科學家。中方團員中，徐炳昶作爲前期中方團長對各國科學家的協調支持以及與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親密合作，丁道衡對包

^① 後來的文獻中，往往將“考查團”逕稱爲“考察團”，雖然文義上不錯，但與當時事實不符。本文在行文時概稱“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敘述中用到動詞時，用“考察”。

頭鋼鐵公司白雲鄂博鐵礦的發現、袁復禮對新疆近百具恐龍化石的發現、陳宗器對羅布泊湖底的探測和地磁學的貢獻、黃文弼對新疆的考古調查，以及李憲之、劉衍淮在中國氣象學領域的成就，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外籍科學家先後出版的 56 卷鴻篇巨制，已成為覆蓋 11 個學科領域的經典之作。

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能夠最終成行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首先是中國知識界獨立覺醒的產物。當時，作為享譽全球的探險家斯文·赫定此前已有四次來過中國。他橫穿波斯和兩河流域的旅行，對樓蘭遺址的發現，以及對藏北地區的考察，使其聲望和影響幾乎與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齊名。此次來中國，是他第五次中國之行。主要使命是接受德國漢薩航空公司的委託贊助，為之勘測一條從柏林經中亞到北京的航線，在北京和迪化(烏魯木齊)之間設置四個加油站、附設無線電臺並建立氣象測候所。按照以往的經驗，應該是故地重遊，暢行無阻。為此，他於 1926 年 10 月來北京，先後拜會了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外交部長攝國務總理顧維鈞、外交次長王蔭泰，以及主政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得到了許可證件和張作霖的大力支持。但使他意想不到的，正當他組織的由瑞典、德國、丹麥等國科學家組成的考察隊即將成行時，卻遭到了中國學術界強烈反對。以劉復(半農)為代表的中國學人和相關學術團體聯名發表通電，一致反對外國人擅自在中國領土上隨意往來，肆意掠取我珍貴的學術和文物資源。斯氏迫於無奈，只好耐心坐到談判桌前，一條一條談條件，一條一條談合作。近乎半年的你來我往，最終於 1927 年 4 月 26 日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達成十九條合作協定。雖不是赫定的最初設想，但於雙方來講卻不失為一個圓滿的結局。此時，離斯文·赫定來北京已過去了半年時間。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公然蔑視官方的許可，接二連三通電全國，最終以強大的聲勢和輿論阻止了斯文·赫定一幫外國人單獨行動，這在備受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上還是第一次。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學術界帶來的民族自強意識，使得他們再也不能忍受清末以來西方列強以遊歷、探險為名派出各路探險家肆意掠奪中國古物和學術資源的行徑。二是因為當時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大都是留洋歸來學有專長的精英人物，他們深知祖國考古、地質、生物等標本和資源對科學研究的重要。“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 14 家組成單位是：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國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畫學研究會、北平圖書館、京師圖書館、中華圖書館協會、中央觀象臺、天文學會、地質調查所、中國地質學會、清華研究院、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等。其中參與呼籲和談判的代表人物有劉半農、周肇祥、袁復禮、沈兼士、馬衡、李四光、李濟、徐炳昶、黃文弼等，他們都是近現代學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三是因為當時的國內局勢為之提供了可能。1926 年下半年的中國，南方各地忙於轟轟烈烈的工農運

動和北伐戰爭，北方的軍閥政客角逐北京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想雄視天下，又都如匆匆過客，無暇顧及這些暫時還危及不到自己權力地盤的文人行爲，客觀上爲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以國家和主人的身份與外國人簽訂如此重大的合作協定提供了空間。十九條協議的核心是：此次考察活動的名稱定爲“西北科學考查團”，團長由中瑞雙方擔任，團員由中外雙方組成；考察經費由斯文·赫定籌措，考察成果共同享有，並在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統一規劃下陸續發表；採獲的文物一律不准帶出境外，地質和古生物標本如有副本者可以贈與斯文·赫定帶回瑞典。顯然，這樣一個協定，既維護了民族自尊和國家主權，又達到了合作考察推動學術之目的，還洗雪了百年來外人掠奪所帶來的屈辱。劉半農先生甚至興奮地宣稱，這是近代以來第一個“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協定本身，不僅規範了此次考察的全過程，也爲後來類似行爲提供了範式。

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能夠最終成行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第二個因素來自斯文·赫定對科學探險的獻身精神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他是一個一生以地理探險爲職志的地理學家，其追求的目標在於地理方面的發現，他要到從來沒有人到過的地方，他要在地圖的空白處留下自己的足跡。他此前多次來中國，試圖登上慕士塔格峰、橫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發現樓蘭遺址、深入藏北地區，都幾乎把自己永遠留在了那裏，同那些專門盜掘古墓、剝走壁畫、卷走大批經卷的掠奪者有很大區別。當他遭到中國學界的反對時，不氣餒、不放棄，積極奔走，爭取諒解，最後使問題得以解決。他是考查團的核心和靈魂，又是經費的籌措者。在德國漢薩航空公司由於中國政府不同意飛行考察計劃而不得不撤回人員資金時，他穿梭於各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其個人的影響和力量籌措到巨額資金，保障了考察活動的如期開展。他關心愛護考察團的每一個成員，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每到一個考察營地，都會給團員們帶來節日般的歡樂。在他的相關著述中，隨處都可看到對中國團員的讚賞和懷念。中外團員中，有的直接將自己孩子的名字起名爲斯文，以表示對這位科學巨人的崇敬和紀念。就連劉半農這樣最初折衝尊俎的談判對手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手後，也深爲赫定的人格魅力所感染。爲了撰寫論文以紀念赫定 1935 年 70 周歲壽辰，劉半農帶着學生前往內蒙古調查方言，不幸患上了回歸熱而離開了人世。這位曾經的留法學子、“五四”運動中與錢玄同唱過“雙簧”，同斯文·赫定談判時“折衝最多的人”（徐炳昶語），寫過《教我如何不想她》，並爲名妓賽金花正名的詩人、才子、學者 43 歲英年早逝，給國人留下了深深的歎惋。考察結束後，赫定等人資助參加考察團的中國學生前往德國留學，學成歸國後都成了各自領域的奠基性人物。直到赫定臨終前，還念念不忘當年的中國友人，捎書帶信，探詢他們的境況，表示了對中國團員的思念之情。所有這

些，都成為中瑞兩國人民和兩國科學家深厚友誼的歷史見證。

還有一位特別不能忘記的人，就是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他發現的居延漢簡和小河墓地，將永遠載入史冊。

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1903年生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1927年來中國時，年僅24歲。其時，他的雙腳剛剛踏出瑞典東南部美麗的烏普薩拉大學校園。從1927年到1935年的八年時間裏，貝格曼有七年多時間沒有離開過考查團，是這個團隊裏時間最長的外籍學者之一。考查團三個階段的活動中，每一次都有貝格曼的身影。第一階段從1927年1月跨出家門到1929年1月回到故鄉，差17天整整兩年時間；其間，在家休整3個月，又於當年4月8日離開斯德哥爾摩再次踏上來中國第二階段的考察之路，到1931年6月18日回到瑞典，兩年又70天；同樣是不到3個月的短暫休息，又於當年9月底第三次踏上來中國的旅途，直到1934年8月底返回瑞典，整整三年時間。他三次來中國，行程數萬里，大部分時間是在荒野戈壁、古塚廢城和駱駝背上度過的，他發現了400多處古代遺址，最為著名者一是居延漢簡，二是小河墓地。

今天的甘肅金塔和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漢代是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的軍事防地。四周沙漠戈壁、低山殘丘。但額濟納河三角洲一帶，水草豐美，胡楊婆娑，是北方匈奴進入河西走廊的天然通道。漢王朝把河西走廊圈入版圖後，為防止匈奴鐵騎再次踏入此地，便從張掖到居延沿着額濟納河(弱水)修築了長達500多千米的一道防線。所謂塞內塞外，成了騎馬民族和農耕民族的一道屏障。此後的漫漫歲月裏，歷代統治者都對此進行了有效管理。後漢時建有張掖居延屬國，魏晉以後設置西海郡，隋設大同城鎮，唐設同城守捉，西夏黨項人在今天的黑城設置過黑山威福軍司。他們留下的星羅棋佈的古代遺迹和大量的地下文物，是後人回望歷史的坐標。

居延漢簡，是貝格曼第二次來中國，也就是在考查團第二階段的考察活動中發現的。如上所說，他從1929年4月8日離開斯德哥爾摩後，原打算從西北通過俄羅斯進入新疆塔城後再經內地抵達北京，但路途不順，塔城當局不發給護照^①。無奈之下，只好繞道西伯利亞，經黑龍江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從東北進入北京。從最西邊繞到最東邊，多走了幾千公里。最後於8月25日到北京，光路途就花了四個多月。9月底辦妥護照，10月1日從北京出發，再次經內蒙的包頭到額濟納流域。考察活動由東往西推進，半年之後的1930年4月27日，在博羅松治(E101°22'26"，N41°32'39")，發現第一

^① 見《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第51頁，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年。

枚漢簡。從此後，在北到額濟納河下游的索果淖爾和嘎順淖爾，南到金塔毛目（今鼎新）的廣大地區，進行了地毯式調查和大規模發掘。跟隨貝格曼同行的有 80 多峰駱駝、大批儀器設備和生活用品。雇用的兩位中國助手，一位叫靳士貴，原先給安特生——寫過《甘肅考古記》的瑞典考古學家——當過助手，田野經驗十分豐富；一位叫王華南，在馮玉祥的部隊擔任過中尉，基督教徒。其餘的就是幾位駱夫和雜役。這次居延考古，從 1930 年 4 月 27 日算起到 1931 年 3 月 27 日，11 個月時間。

11 個月裏，貝格曼及其同行，在空曠寂寞的戈壁荒漠中，與風沙作伴，與胡楊為伍，送走了一輪輪傍晚的落日，迎來了一顆顆黎明的晨星。經受過零下 30 多度的嚴寒，也烘烤過零上 40 多度的烈日。傾聽過春日裏額濟納河兩岸萬物復蘇的腳步，領略過秋日裏胡楊林畫染般的景致。飽嘗了人們難以想像的艱辛，也享受過收穫後的喜悅。在南北 250 千米、東西 40 千米的範圍內，踏查了 410 多處遺址，出土了 3 700 多件古代遺物。尤其是 10 000 多枚漢簡的出土，給中國和世界學術界帶來極大的興奮。這些漢簡出自 30 個不同地點，其紀年簡上起西漢征和三年（前 90 年），下迄東漢陽嘉二年（133 年），前後跨越 220 多年。這是當年駐守此地的軍政系統留下的原始檔案，是邊防將士戍守、生活和各種活動的生動記錄，是後人研究西北邊疆的第一手資料。

1931 年 3 月 27 日，貝格曼 40 多峰駱駝的駝隊滿載着隨行家當和發掘的古物，在悠揚的駝鈴聲中迎着東方的朝日踏上了東歸之路。他在居延的田野考古告一段落。

將近 50 天的行程結束後，貝氏於當年 5 月 19 日回到北京，6 月 3 日啟程回國，6 月 18 日到達斯德哥爾摩。從 1929 年 4 月 8 日至此，兩年零 70 天。

十二箱居延漢簡和其他文物於 1931 年 5 月運抵北京，先存放於北平圖書館四庫閱覽室。馬衡和劉半農於是年 7 月監督開箱，並組織人員整理釋讀。第一步工作：拆包、清點、登記、編號、製卡、存放，由傅振倫和傅明德負責進行。至於文字釋讀，起初按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的安排，要由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學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馬衡、劉復共同完成。但實際上高、伯基本未能參加，劉半農兼職過多顧不過來，只有馬衡一人堅持工作。而馬衡也不是每天到班，只是隔幾天去一次，工作進度比較緩慢。到 1934 年初，只做完了瓦因托尼（A10）和大灣（A35）出土的 1 700 多簡的釋文。1933 年 7 月，胡適以北大文學院院長兼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傅斯年以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和北大教授的身份出任副委員長，再加上胡、傅二人又都是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理事。多方歸一，事權集中，協調起來自然容易得多。於是決定，把這批漢簡從北平圖書館搬到景山東街馬神廟崧公府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學會，並重新組織了整理班子。

從1934年10月起，由北平圖書館的向達、賀昌群，北大的余遜和史語所的勞榦四位年輕才俊協助馬衡完成釋文。前四位直接釋讀原文，馬衡則負責對他們的釋讀初稿進行審校。當時按照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1934年10月23日和12月2日的會議記錄^①，擬參加釋文整理的人員除上述5位外，還應有徐森玉、沈兼士、陳受頤、蒙文通、孟森、姚從吾、傅斯年等。但後面所列各位，實際上並未直接參與，只有上述向、賀、余、勞、馬五位在釋讀整理。向達、賀昌群二先生此前有過一段大致相似的經歷，都在商務印書館擔任過編譯工作，後又同時擔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學界已有相當名氣；而余遜是余嘉錫先生的哲嗣，以當時輔仁大學陳垣校長的“四大翰林”之一而聞名士林；勞榦是清末兩廣總督勞崇光的後人，官世家學，源淵有自。至於馬衡先生，更是如雷貫耳。他是繼吳昌碩之後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長，其時又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學界聲望極隆。以這樣一個班底來整理居延漢簡，可謂一時之盛，令人仰望。但是，時運不佳，好景不長。兩年之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止了這項工作。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北平的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緊急南遷，教師學生蜂擁奔波在南逃途中。10 000多枚漢簡身處危境，兩年中所做的釋文和照片也不知去向。空空的北大校園只有日本軍隊的汽車和巡邏隊不時出沒，有的校舍已成了侵略者的兵營。

尚未離開北平的劉半農的弟子沈仲章，也是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幹事。今天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收藏的僅有的幾次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的會議記錄，就是沈仲章的手筆^②。其時，他在劉半農生前建立的語音實驗室工作，而語音實驗室和漢簡整理室同在一個四合院，前者在四合院的北屋裏，後者在東西兩邊的廂房裏。沈仲章深知，這批漢簡如果落入敵手，那將是民族的恥辱，文化的毀滅。所以他毅然決然，奮不顧身，約上同在語音室工作的周殿福，趁風高月黑之際，躲過日本兵的巡邏，在工友的幫助下，冒死把這批漢簡搶運了出來。漢簡裝在兩個大木箱裏，先被藏在崧公府北大圖書館後面北長街的一個小廟裏，後又以私人財物的名義存放在德華銀行。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的前一天，他混在逃難的人群中乘火車趕往天津。在天津，打電報給時在南方的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徐森玉又立即聯繫傅斯年。得到傅的指示後徐又專程趕回天津，找沈仲章商量辦法。

淞滬抗戰爆發後，運往上海的可能已不復存在。按照傅和徐的意見，這批漢簡仍

① 邢義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見邢著《地不愛寶》第526頁，中華書局，2011年1月。

② 同前揭。

由沈仲章負責，直接運往香港。於是，沈仲章歷盡艱險，在將近半年的時間裏，來往滯入京津之間，利用中立國和德、意等國的銀行、輪船公司，由北京而天津、由天津而青島、再由青島而香港，最終於 1937 年年底把這批漢簡運到了香港大學。

運到港大的漢簡，在許地山教授的聯繫下存入馮平山圖書館。不管條件如何艱苦，傅斯年都時刻不能忘記漢簡的繼續整理。在他看來，能否儘快發表，牽扯到中國知識界的尊嚴和面子。即使偏安一時，整理工作也不能中斷。於是安排沈仲章，在守候漢簡的同時，因陋就簡，開始新一輪整理。重新上架，登記、照相、編排、剪貼，打算完成後送往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製出版。中英庚款管理委員會理事葉恭綽先生大力支持，從中斡旋，在庚款中解決了沈仲章在港的生活來源和其他費用。沈氏在港一待就是三年，將所有照好的照片沖洗兩份，一份寄往遠在西南的勞榦，一份擬送商務印書館。但隨着日本侵華戰爭的蔓延，香港吃緊，居延漢簡的整理再度受挫，已製成的書版和底片，也在香港淪陷時灰飛煙滅。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一年，香港地區已面臨危險，漢簡的安全又成了問題。傅斯年等人本打算將其就近轉移到昆明或馬尼拉，但考慮到氣候因素，不便保存。最後只好與遠在美國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商議，決定運往美國，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胡適在美國，有廣泛的社會交往，同時又遙領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的理事長，既是職責所在又有諸多便利。還有王重民、房兆楹和朱士嘉三位正供職於國會圖書館，所以漢簡來此，成了唯一的選擇。1940 年 8 月 4 日，這批漢簡乘上開往美國的輪船從香港啟航，經兩個多月的漂泊，於 10 月 26 日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分裝成 14 個小箱，存入該館善本圖書室。在其後的 25 年裏，山河易主，臺海相望，原來一起關心和主持漢簡整理的學者也是天各一方，音訊難通。居延漢簡在這裏沉睡了 25 年之後，又於 1965 年 10 月 21 日和袁同禮館長寄存在這裏的 102 箱珍貴古籍一起被臺灣方面派人提出，於 10 月 28 日運抵三藩市奧克蘭海軍基地，11 月 3 日乘美海軍運輸船，11 月 23 日到達臺北，從此結束了這段漂泊海外的歷史。1966 年 1 月 27 日至 29 日，臺灣方面開箱點驗，當局派“監察院”、“立法院”、“外交部”、“教育部”、“經濟部”、“中央圖書館”、“中研院史語所”等七大大部門親臨現場，監督和參與點交，以這種莊嚴和神聖的形式，顯示了對這批居延漢簡的珍視。

至於整理成果的公佈發表，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程。1936 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將余遜和勞榦兩人的釋文用曬藍紙印刷成冊，世稱“曬藍本”，這是居延漢簡最早的釋文本。所憾只有釋文而無圖版，且釋文也只有 3 055 條，只是全部居延漢簡的三分之一。抗戰爆發後，如上所說，漢簡被運往香港，運往美國。當年參加整理的人員也隨單位的南遷而分散各地。只有勞榦一個人隨着中研院史語所在先遷長沙、而後昆

明，再遷李莊的過程中，利用沈仲章在香港所拍反體照片重新又作了釋文，並於 1943 年和 1944 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49 年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用活字印行了《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57 年在臺北印行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從此後，居延漢簡才有了比較完整的材料以供學術界研究。1981 年，臺北出版了馬先醒的《居延漢簡新編》，1998 年又出版了史語所編的《居延漢簡補編》，整理工作臻於完成。

在中國大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 1959 年編輯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編》，包括 2 555 枚漢簡的照片、釋文和索引。1980 年，又編輯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基本包括了居延漢簡的全部。

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發表了數以千計的著作和論文，給學術界帶來了全新的面貌。居延漢簡發現保護整理的歷史折射了“五四”以後那些風起雲湧的年代。上面提到的每個人，幾乎都是學術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他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居延漢簡，還有一座彰顯其人格品質和愛國赤誠的精神寶藏。

我們今天憑弔古迹，閱示漢簡，魂牽夢繞般不能忘記的，還有這段歷史。

漢代郡縣鄉亭之等級

廖伯源

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秩律》^①曰：

廷尉、內史……郡守、尉……秩各二千石。

(頁 192/簡 440—441)

內史、郡守、郡尉之秩皆二千石，與九卿同列。此為漢初高后二年(前 186 年)時之制，內史、郡守、郡尉之秩相同，不分等級。^②

傳世文獻言及漢郡守、尉之秩級者稍詳，亦可據以分漢郡之等級。史書述漢內史於景帝時分為左、右內史，武帝時又分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輔。內史、左內史、右內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得稱為九卿。^③嚴耕望《秦漢地方行政制度》^④謂漢郡之等級，除三輔為畿郡，其長官與九卿同列，地位特殊外，一般之郡有時亦分大小。其引《漢書·元帝紀》^⑤為證：

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為大郡”。三年，“令三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所引釋文之頁數詳下文。

② 此為僅有之漢初郡守、尉秩級之資料，據此立說，不分等級。

③ 考詳徐復觀：《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第 213—216 頁，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年。

④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初版刊於 1961 年)，第 218—221 頁，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1974 年。

⑤ 本文所引正史，皆引自中華書局點校本。

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①

是西漢元帝時曾分郡爲大小，戶十二萬以上者爲大郡，其郡太守秩中二千石，郡都尉秩二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載郡守“秩二千石”，郡尉“秩比二千石”。（19 上/743）大郡太守、都尉秩皆高於常郡長吏秩一級。按：宣帝重視郡國守相，“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②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增秩爲中二千石。然此皆特例，元帝劃一制度，以十二萬戶以上爲大郡，其太守秩中二千石。

《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又引《漢舊儀》曰：

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爲萬騎太守，月奉二萬。綏和元年，省大郡、萬騎員秩，以二千石居。^③

按：“月奉二萬”當是秩中二千石之月俸。^④若干邊郡萬騎太守月俸二萬始於元朔三年，蓋武帝征伐匈奴之特別措施。元帝建昭三年（前 36 年）令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至成帝綏和元年（前 8 年）省大郡太守、萬騎太守秩爲二千石，則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僅施行二十餘年，郡太守秩二千石爲漢代之經制。

《尹灣漢墓簡牘·東海郡吏員簿》牘文謂東海郡“太守一人秩□□□□”（79-2），又謂“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79-3），《尹灣漢墓簡牘·集簿》謂東海郡有戶廿六萬餘（77-10），是所謂大郡。“《集簿》是成帝晚年（最可能是元延年間）之物。”^⑤元延年間（前 12 年—前 9 年）是施行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大郡都尉秩二千石之時，則上引牘文“太守一人秩□□□□”所空四字，應是“中二千石”。

① 《漢書·元帝紀》卷九，第 294 頁。前引《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 39 頁。

② 《漢書·循吏傳》卷八十九，第 3624 頁。又王成事見第 3627 頁，黃霸事見第 3631 頁。

③ [漢] 衛宏撰：《漢官舊儀》卷下，[清] 孫星衍等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第 49 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④ 據此條所言，武帝時萬騎太守“月奉二萬”；成帝綏和中，省萬騎太守秩爲二千石。二千石之上唯有中二千石、萬石，郡太守之秩不可能萬石，則“月奉二萬”應是中二千石之俸祿。《漢書·貢禹傳》：禹於元帝時上書自謂“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卷 72，第 3073 頁，《漢書補注》引周壽昌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卷 72，第 12 頁）〕中二千石高比二千石兩級。其月俸分別爲二萬及萬二千，於理亦順。本文所引《漢書補注》，爲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光緒二十六年長沙王氏校刊本”。

⑤ 《尹灣漢墓簡牘·前言》，第 4 頁。見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